



周恩来与陈望道

□ 周 晖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助力和领导下，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宣言》的问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本著作也被人们誉为“红色中华第一书”。周恩来一生坚守信仰、理想坚定，留下了许多与《共产党宣言》及陈望道的佳话。

一生信仰 终身学习

周恩来是我们党较早接触、学习并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10月，周恩来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揭露工俭学生遭迫害的境况，文中就强调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句意：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提出我党应及时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再次引用了《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将有政见宣布的必要。”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只要一有空，他就拿出来学习，并用来指导当时具体的革命实践。1936年，周恩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至今，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还展陈着1943年12月周恩来在延安时期读过的其签名版《宣言》。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很短时间，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握着陈望道的手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每次开会见到陈望道，总要问及《宣言》。陈望道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总理就用英文和我交谈，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和我商讨翻译上的一些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一份友谊 肝胆相照

正因为深受《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它的首译者陈望道

也格外关心关爱。

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享有“夏坝的延安”美誉，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陈望道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正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十分关心复旦大学的统战工作。他不仅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在复旦设立“据点”领导学校的对敌斗争，还常常记挂复旦的进步教授。1940年9月23日，是陈望道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想亲自来校看望我们，但他考虑到当时的重庆到处是白色恐怖，特务、密探横行，担心来看望我们后，国民党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麻烦，甚至大打出手，故特地托人捎信来问：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方便？”陈望道等在碚的学者们知道周恩来要亲临学校看望大家，高兴极了，深为周恩来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关心专家们人身安全的做法而感动，心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见见周恩来。“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转告周先生，我们欢迎他公开来。”陈望道回忆。

周恩来得到回讯之后仍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就特意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北温泉数帆楼。当天他和邓颖超与陈望道等专家学者们共进了午餐，同大家讨论了时事，表明了我们党的主张。过了很多年后，陈望道仍撰文评价道：周总理亲临北温泉看望我们，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关心，“消息传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2年2月底，一次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海内外著名学者应邀在虹桥机场出席外宾迎送仪式。那天虽春寒料峭，81岁高龄的陈望道还是早早来到机场，站立在迎宾的队伍中等候。此时，同样早已来到机场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便疾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其身体状况，嘱咐他多多保重。随后，周恩来对身旁外事组的干部说：“望道同志年纪大了，到机场路远，很累，以后不要通知他到机场迎送外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一世惦念 临终关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由于年代久远、岁月动荡，加之当时仅印刷1000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踪影，周恩来一直十分牵挂。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罹患重症、坚持到会的周恩来还急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已找到首印本，并殷切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总理期待的目光，摇了摇头。周恩来遗憾地表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陈望道译的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省广饶县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促使他树立一生信仰的书了。

如今在复旦大学《宣言》展示馆二楼陈望道曾经用过的书桌上，还能看到一张邓颖超给陈望道的回函，这封便笺上写道：“陈望道同志：你的信笺和著作，早已收到，谢谢你，并希谅迟复。你住华东医院，是否身体违和？请希保重，祝你早日康复！专复致以革命的敬礼！邓颖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原来，1975年3月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得知周恩来病重住院、不能参会，即请邓颖超同志转达问候，回沪后又致信周恩来询问病情，随信寄了一本1975年再版的代表作《修辞学发凡》，不料几个月之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时隔10个月，邓颖超仍不忘回函，既是致谢、又是代周恩来对陈望道表达关心和慰问，彼时的陈望道经历了一场大病，亦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短短的纸笺，再一次印证了两位革命先驱的珍贵友谊。

伏击歼敌 奇兵制胜

——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 马伟宣 赵连稳

敌机十余架飞来轰炸时，我得胜之师，早已肩荷胜利品，高唱凯歌，转移宿营了。

响堂铺一战是一二九师在半月之内，继邯（郸）长（治）大道神头岭大胜之后，对侵犯太行的日寇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更加坚定了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信心，在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了铭记革命先辈的不朽功业，昭励后人，发扬革命传统，特立碑于此是为志。

中共涉县委员会
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涉县人民政府 撰稿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原一二九师敌军工作部副部长 张香山 审定
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立

碑文记述了响堂铺伏击战的战斗过程及重大意义，展现出八路军战士前仆后继赴国难、铮铮铁骨战强敌的英姿，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谱写了壮丽凯歌，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昭示着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气焰极为嚣张，八路军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29师自挺进太行以来，相继取得长生口、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为了歼灭侵入晋东南的敌人，扰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切断日军支援晋西、晋南的粮弹供应线，129师决定寻找适当地点，伏击日军后勤补给运输队。

邯长大道是日军108师团在晋作战的重要物资补给线，运输车辆来往频繁，自神头岭伏击战后，日军加强了对邯长大道的警戒守卫。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在反复商讨研究当时的战争形势后，一致决定再次以伏击战的形式痛击运输线上的日军。徐向前带领李达、陈赓

等人多次实地勘察后，商定将响堂铺作为设伏地点。

响堂铺是邯长大道上的一个小村庄，其南北两侧多为起伏的高地，沟壑纵横，便于部队隐蔽和伏击，埋伏于此胜算更大。待确定伏击地点和时间后，129师便开始进行战斗准备与思想动员。当时，很多战士都没有见过汽车，组织上专门进行集中培训，给战士讲解汽车的构造与打法。邓小平、徐向前亲自参与思想动员大会，鼓舞战士斗志。徐向前对参加伏击战的部队进行了分工，各参战部队于3月30日晚进入伏击地点，战斗一触即发。

3月31日凌晨，129师下辖的769、771、772三个团在徐向前的亲自指挥下，做好埋伏与掩护工作，只待敌人上钩。此时的太行山区，春寒料峭、寒气逼人，战士们虽然饥寒交迫，但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待到日军运输部队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随着徐向前的一声令下，霎时地动山摇，我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前后夹击。顷刻间，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向敌军开火，毫无戒备的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车队横冲直撞、混乱不堪。部分日军跳下汽车，寻找掩体，负隅顽抗。勇敢的八路军将士手持砍刀、红缨枪俯冲而下，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

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敌军溃败，仓皇逃窜，经过近3小时的激战，我军胜利结束伏击战斗，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烧（击）毁汽车180辆，并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伏击战打响后，附近的日军急忙赶来增援，均被先前早已埋伏于周边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延安时期怎样从严治党

□ 王锦霞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

延安时期，一些党员身上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39年7月，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要清除一切腐败堕落现象，树立优良的风气。

一是进行调查研究，转变作风。毛泽东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的一环。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带头到农村进行调查。张闻天历时一年多进行了农村调查，写了《出发归来记》的调查报告。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不良之风。1942年，全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的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受到了思想和作风的深度洗礼。党的七大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三是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还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在党的倡导下，根据地涌现出了大批先进人物和事迹，如“朴素浑如田舍翁”

的朱德、“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马锡五、“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等，进一步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党风。

以民主监督为手段

延安时期，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独断专行、不善于接受批评的现象，党内外加大了民主监督力度。比如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进行了民主选举，人们放手检查政府工作，批评缺点，淘汰了不称职的干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边区政府要求各县县长和群众面对面检查政府工作，征求群众意见。清涧县群众检举解家沟区长包庇贪污分子，要求查处，最终区长职务被撤销。农民参议员刘德富感慨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地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通过党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民主监督，使全党上下形成了畅所欲言，团结一致的大好局面。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延安时期，针对个别党员干部存在违法违纪问题，从政治、财务、民主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制度建设。鉴于张国焘分裂党、王明严重违法党的组织纪律的教训，先后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



的我军击退。与此同时，八路军指战员和群众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打扫响堂铺战场，仅战利品就用牲口驮了400多驮子。下午4时，多架敌机前来助战轰炸，我军早已高歌凯旋，日军气急败坏，朝着汽车残骸和死尸狂轰滥炸。

至此，响堂铺伏击战大获全胜，此战部署周密、指挥得当、作战迅速、干净利落，刘伯承连连称赞道：“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此刻，在正面战场上接连失利的国民党将领得知八路军又一次胜利的消息后，深感钦佩，无不心悦诚服。响堂铺伏击战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奇迹，更加坚定了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必胜信心。



以严管严治为特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执纪从严，对于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惩治更加严厉。比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37年10月，毛泽东就抗大干部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0年，边区又判处贪污腐化的肖玉璧死刑。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虽然二人都是革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但最后均被判处死刑，起到了强大的震慑警示作用，刹住了边区贪污腐化之风，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